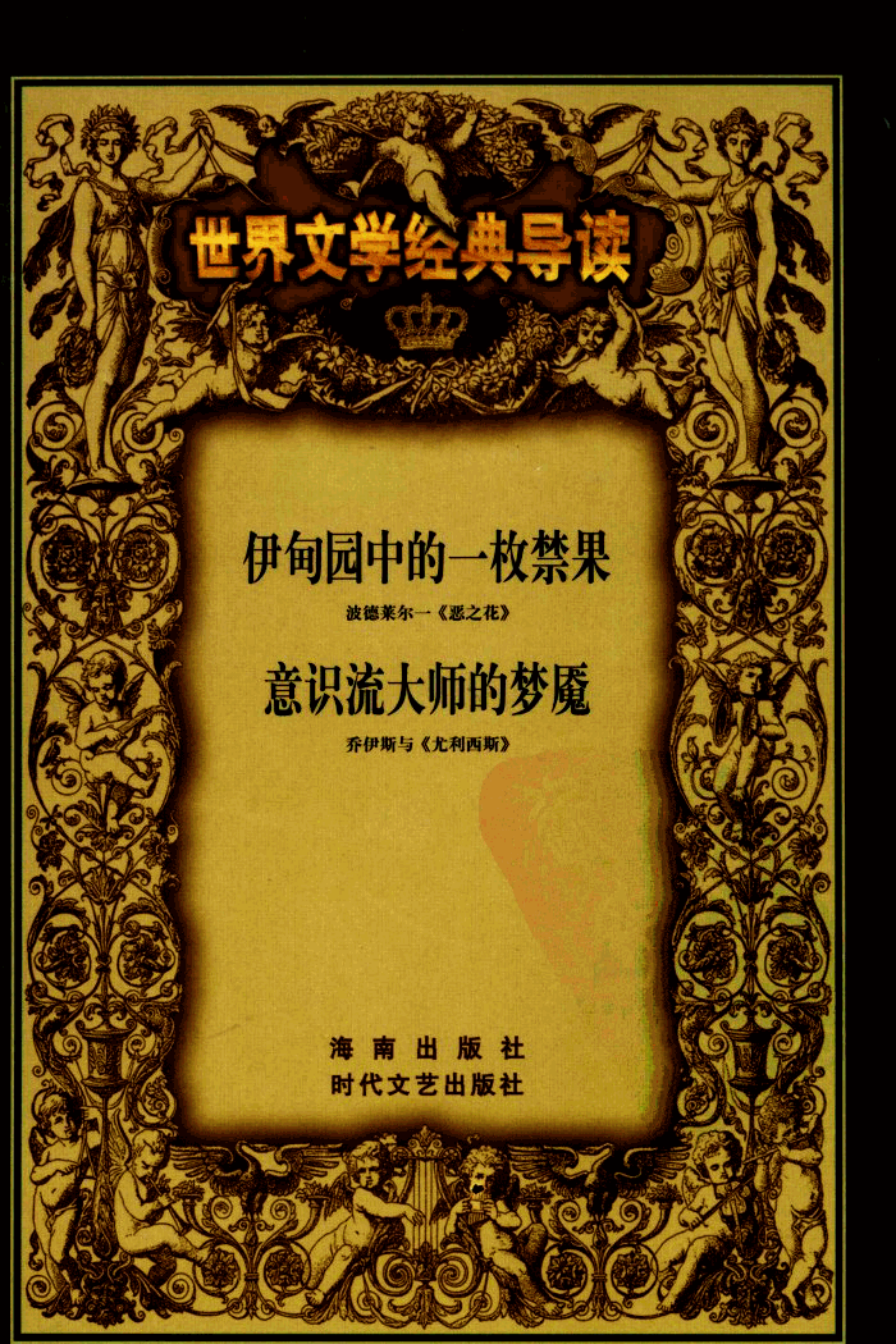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经典导读

伊甸园中的一枚禁果

波德莱尔—《恶之花》

意识流大师的梦魇

乔伊斯与《尤利西斯》

海南出版社
时代文艺出版社

I06
18
:23

伊甸园中的一枚禁果

——波德莱尔与《恶之花》

郭宏安

海南出版社
时代文艺出版社

内容简介

一个诗人仅仅凭藉一本诗集就占据了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位置，这人就是独具魅力的法国诗人波德莱尔，这本诗集就是惊世骇俗的奇书《恶之花》，本书将帮助读者了解波德莱尔其人其诗，引导读者兴趣盎然地游历恶之花园。

引言

在古代，种种原因使许多作品散佚流失，一位伟大的作家可以只有很少的作品。那么，在近现代，一本薄薄的只包含一百多首诗的小书能够使一个人跻身一国乃至世界最伟大的诗人之列吗？如果能，这个人一定是一个独特的人，这本书一定是一本非凡的书。

文学的历史果然提供了一个绝无仅有的例证。这个人是法国诗人波德莱尔，这本书是《恶之花》。波德莱尔的独特不在于他的怪诞，而在于他的清醒；《恶之花》的非凡不在于它的刺激，而在于它的深刻。

1857年6月25日，《恶之花》经过多年的蓄积、磨砺，终于出现在巴黎的书店里。它仿佛一声霹雳，刹那间震动了法国诗坛，引起了沸沸扬扬的议论；它又像是一只无情的铁手，狠狠地拨动着人们的心弦，令其发出“新的震颤”。

它不是诺瓦利斯的“蓝色花”，虽然神奇诡异却并不虚幻缥缈，因为它就扎根在具体的时空里。它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

力，却令怯懦者畏葸不前，因为它揭开了人心最隐秘的角落。它又蕴藏着地火一样的潜在的威力，使秩序的维护者胆寒，因为它是一颗不安的灵魂的抗议。

果然，《恶之花》遭到了“普遍的猛烈抨击，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好奇”，正是作者的追求；“抨击”也不能使他退缩；然而，跟在“抨击”之后的却是法律的追究，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第二帝国的法庭自然不配做诗国的裁判官，可就在文学界，这本不厚的小书也引起了唇枪舌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毁誉参半，相持不下。竟使得波德莱尔在法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久久不能排定。

儒勒·瓦莱斯问道：“他（波德莱尔——笔者注）的‘不朽’能维持10年吗？勉强！”

青年时代的艾米尔·法盖心中常想：“《恶之花》不是传世之作……”

1884年，莫里斯·巴莱斯认为，有朝一日，《恶之花》“将被人遗忘”。

1917年，纪尤姆·阿波利奈尔断言：“他（波德莱尔——笔者注）的影响现在终止了，这不是一件坏事。”

……

然而，1987年11月1日，法国《快报》周刊（第1426期）公布了一份《法国在读书》的调查报告，报告表明：46%的读者喜欢阅读波德莱尔的作品，而所谓“波德莱尔的作品”，只能是《恶之花》和他的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而后者可以说是前者的形式上的对应物，在精神上“仍然是《恶之花》”。此类调查报告几乎年年都有，而波德莱尔和他的《恶之花》也几乎总是名列前茅。

此中的奥秘，正如路易·阿拉贡所说：“没有一个诗人能比波德莱尔引起人们更多的热烈情绪。”

关于诗，维克多·雨果说它“灼热闪烁，犹如众星”，阿尔弗莱德·德·维尼看到的分明是“善之花”，埃德蒙·谢雷却只闻到了令读者掩鼻的“臭气”。

……

关于诗人，阿尔杜尔·韩波呼为“真正的上帝”，T·S·艾略特奉为“现代所有国家中诗人的最高楷模”，费迪南·布吕纳吉埃却称之为“旅馆中的撒旦”。……

针锋相对，各趋一端，毁誉双方的“情绪”果然“热烈”。于是，人们自然要问：

毒草乎，香花乎，《恶之花》？

鬼耶，神耶，人耶，波德莱尔？

多少年来，《恶之花》被包裹在一片神秘、危险、甚至邪恶的气氛中，诱惑着各个时代、各个年龄的读者。马克斯·波耳·福歇曾经这样描述过他最初阅读《恶之花》的情景：“《恶之花》被我的父母藏在柜顶……那只普通的柜子，在我看来，就是一株知善恶树。40年过去了，我觉得还能感到当时的心跳，害怕楼梯上的脚步声，因不能完全读懂而痛苦，还有那看到愚蠢的图画时肚子里的骚乱……波德莱尔比其他人更使我体验到反抗和美妙的苦恼。他使多少人走出了童年时代啊！”

童年，既是指生理上的童年，更是指精神上的童年。那些敢于正视社会和人生的读者，通过《恶之花》，看到了一个满目疮痍的社会，体验到一个备受摧残的人生，听见了一阵阵从地狱中传来的呼声，他们心中或许会生出一股怜悯的暖流，或

许会腾起一团反抗的怒火，或许会敲响一阵自警的暮鼓晨钟……总之，他们会获得一副更冷静、更勇敢、更深邃的目光，从而不再为虚伪的纱幕所蒙蔽，不再为盲目的乐观所陶醉，也不再为世间的丑恶所吓倒。

《恶之花》是伊甸园中的一枚禁果，它就盛开在地狱的边缘，只有勇敢而正直的人才能够摘食，并且消化。他们无须等待蛇的诱惑。

目 录

伊甸园中的一枚禁果

1	引 言
1	逃出樊笼的一只“天鹅”
23	在恶之花园中游历
42	在“恶的意识”中凝神观照
51	一个世纪病的新患者
68	时代的一面“魔镜”
81	应和论及其他
100	在浪漫主义的夕照中
115	穿越象征的森林
130	按本来面目描绘罪恶
144	“我将独自把奇异的剑术锻炼”

逃出樊笼的一只“天鹅”

《恶之花》中有一首诗，名为《天鹅》，这首诗中写道：

我看见了一只天鹅逃出樊笼，
有蹣跚的足摩擦着干燥的街石，
不平的地上拖着雪白的羽绒，
把嘴伸向一条没有水的小溪，

它在尘埃中焦躁地梳理翅膀，
心中怀念着故乡那美丽的湖：
“水啊，你何时流？雷啊，你何时响？”
可怜啊，奇特不幸的荒诞之物，

几次像奥维德笔下的人一般
伸长抽搐的颈，抬起渴望的头，
望着那片嘲弄的、残酷的蓝天，

仿佛向上帝吐出了它的诅咒。

在这意味深长、充满象征的三节诗中，波德莱尔把人的处境和命运浓缩在生动而鲜明的形象之中。“天鹅”象征着人，“樊笼”象征着人所受到的困扰和束缚，“雪白羽绒”象征着人在天堂中的纯洁无邪。然而摆脱了桎梏的人并未回到天堂，只是走出了小樊笼，进入了大樊笼，他面前是“干燥的街石”、“不平的地”和“没有水的溪”，他只能在心中怀念失去的乐园——“故乡那美丽的湖”。而那上帝居住的蓝天是“嘲弄的”，嘲弄在地上笨拙地挣扎着的人；它又是“残酷的”，听凭尘埃玷污雪白的天鹅。终于，天鹅怀着渴望复归天堂的心情向上帝发出了谴责，“吐出了它的诅咒”。这正是奥维德在《变形记》中描绘的、在混沌中初生的人的形象：

造物主抬起了人的头，
命他仰望天空，注视星辰。

这个人，无论身在何处，受到何种磨难，终生都将在向往希冀中度过，他的向往是天堂，他的希冀是获救。这不也是诗人的一幅自画像吗？波德莱尔正是一只逃出樊笼、在污泥中挣扎而且诅咒上帝、怀念故乡的白天鹅。

夏尔·波德莱尔于1821年4月9日出生在巴黎。

1925年左右。在卢森堡公园里，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位眉毛漆黑的老人领着一个四五岁的孩子散步。老人指点着那一

座座美丽的雕像，讲述着有关它们的神话和历史，孩子则出神地听着。这个孩子就是波德莱尔，他后来写道：“形象，这是我最初的强烈爱好。”那个老人不是他的祖父，而是他的父亲，约瑟夫—弗朗索瓦·波德莱尔，那时已经年逾花甲了。

约瑟夫—弗朗索瓦·波德莱尔出生在法国东北部马恩省的一个农民家庭里，曾在巴黎大学受过哲学和神学教育。他后来放弃神职，到一位公爵家里当了家庭教师。那时的家庭教师不像后来那样地位卑微，寄人篱下。他有相当大的自由，往来的尽是达官贵人，他又爱好文学艺术，结交了不少文人画家，他自己也喜欢画几笔，颇有些收藏。他还与具有自由思想的爱尔维修夫人、卡巴尼斯、孔多塞等人过从甚密。他一方面学得了一套贵族的派头和习气，另一方面也接受了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学说。对于1789年的资产阶级大革命，他抱热烈拥护、积极参加的态度，同时，他也并未因此就忘了老朋友，很帮了他们一些忙，其中有人得以免上断头台，保住了性命。大革命以后，他救过命的东家帮他在卢森堡宫中谋得了一个高级职务，但是波旁王朝复辟以后，他旋即辞职，过起了相当优游的富贵闲人的生活。当他于1819年续娶卡罗琳·杜费斯的时候，已经是个60岁的老人了，而新娘是个无依无靠的孤女，年仅26岁。

波德莱尔常常认为，父母年龄相差悬殊对他的精神有着某种先天性的影响，这也许可以由医生作出回答。可以肯定的是，父亲的启蒙思想，对绘画的爱好，以及贵族的作风，确实给幼年的波德莱尔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波德莱尔才仅六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他失去了唯一可能理解他的亲人。他和母亲相依为命，开始了“一段热烈的充满爱的时期”。卡罗琳·杜费

斯是个性格忧郁、感情纤细、笃信宗教的女人。波德莱尔短暂的一生极少快乐的时刻，现在是他体验爱抚和关怀的时候了。正当他尽情享受这“充满母性柔情的好日子”的时候，年轻的母亲服丧的期限未过，就改嫁欧比克少校了。波德莱尔幼小敏感的心灵第一次受到了巨大的震动。他一直不能理解母亲为什么要再嫁，那美丽温柔的母亲只能属于他一个人，岂容第二个人来分享她的感情？他觉得父亲被出卖了，母亲对他的爱被出卖了，他对母亲的眷恋被出卖了。他不仅痛恨这个突然闯进来的陌生人，也迁怒于自己的母亲。据他自己后来说，新婚之夜，他把新房的钥匙扔进窗外，让新婚夫妇进不了新房，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怨恨。那时他只不过是七岁的孩子。这也许不是事实，但足以说明他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

然而，孩子毕竟是孩子，心灵上的创伤也许要等待多年才会发作。实际上，开头几年，父子之间并未发生什么龃龉。从波德莱尔中学时代的一些家信看，他对继父可以说怀有某种崇敬却又不乏亲切的好感。欧比克是后来成为七月王朝首领的路易—菲利普的朋友，是个古板、生硬的军人，资产阶级秩序和道德的忠实维护者。他对继子的聪慧感到骄傲，竭力想博得他的好感，不能说待他不好。他想把波德莱尔培养成一个循规蹈矩的官场中人。但是，波德莱尔年事渐长，日交往强烈地显露出独立不羁、藐视习俗的性格，与继父的意图恰恰背道而驰。1832年，他随母亲到了继父的驻地里昂，进了中学。那正是七月革命后的日子，资产阶级自由派篡夺了胜利果实，建立起银行家的统治，1831、1834年的里昂工人起义遭到残酷的镇压。波德莱尔在里昂时的最大乐趣就是在城里游逛。寄宿学校的生活已经使他感到烦闷和忧郁，而破败的街区、肮脏的工

厂、工人的悲惨生活、几乎总是烟雾弥漫的天空，又使他的“沉重的忧郁”变得更加沉重。他的学业优秀，在希腊文、拉丁文和法文上显露出才华。他敏感，激烈，举止古怪，充满了奇思异想，有时又有些神秘和玩世不恭，嘴里还常常吟诵着雨果和拉马丁的诗句。4年之后，1836年，他随父母回到巴黎，进入路易大帝中学。他是个才华出众，却不守纪律的学生，出语尖刻，常常对学校当局表示不敬，洋溢着反叛精神，终因一次拒绝交出同学传递的纸条而被开除，这件事发生在1839年4月18日。这是波德莱尔与社会的第一次冲突。后来他被送进一家寄宿学校，同年8月，他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据他自己暗示，那是由于他和考官的保姆暗中做了手脚。波德莱尔的中学时代是在孤独中度过的。他曾写道：“尽管有家，我还是自幼就感到孤独——而且常常是身处同学之间——感到命中注定永远孤独。”因此，尽管他“对生活和玩乐有着强烈的兴趣”，却并不曾体验过少年时代的幸福和欢乐。

通过中学毕业会考之后，波德莱尔面临着职业的选择。欧比克夫妇希望他进外交界，而他却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当作家。有地位的资产阶级家庭一向鄙薄作家和艺术家，尤其看不起以此为职业的人。在欧比克夫妇看来，波德莱尔的行为简直是一种叛逆。他的母亲20年后回忆说：“当夏尔拒绝了我们为他做的一切，而想自己飞，想当作家时，我们惊呆了！那在我们一直是幸福的生活中是多大的失望、多大的悲哀啊！”

波德莱尔离开了中学，在一所法律学校注册，其实并没有去上课，而是去过“自由的生活”了。他大量地阅读罗马末期的作家的作品，着迷于他们的颓废情调；他阅读七星诗社诗人的作品，叹服他们声律的严谨；他阅读巴尔扎克的作品，并因

结交了他本人而感到十分荣耀；他在美术展览会上留连，重新唤起他“最初的强烈爱好”；他喜欢拜伦、雪莱、雨果、戈蒂耶，为浪漫主义——“美的最新近、最现时的表现”所征服。大约是在这段时期，他通过巴尔扎克接触到瑞典哲学家斯威登堡的神秘主义。同时，他沉湎在巴黎这座“病城”中，出入酒吧咖啡馆，追欢买笑，纵情声色，浪迹在一群狂放不羁的文学青年之间。他的不加检点的生活终于引起了家庭的不安，决定让他出游，离开巴黎，试图通过“改变环境”来把他的生活引入正轨。这是当时富有的家庭针对不听话的子弟惯用的手段，算不上是什么惩罚，波德莱尔似乎也没有什么怨言。于是，1841年6月9日，他在波尔多登上南海号客货轮，启锚远航。

计划的旅行长达18个月，目的地是印度的加尔各答。然而，20岁的波德莱尔抵挡不住五光十色的巴黎的诱惑，他当作家的心愿又使他对继父的意图嗤之以鼻，因此在船上一直悒郁寡欢，闷闷不乐，每日只以巴尔扎克的小说为伴。他非文学不谈，可那些船员和军界商界的乘客如何能与他谈文学呢？不久，欧比克就收到船长的一封信，认为要改变波德莱尔的志向为时已晚。果然，波德莱尔只到了毛里求斯岛和留尼汪岛（当时叫做波旁岛），就迫不及待地搭船返回法国，于1842年2月15日抵达波尔多，并且声称：“我口袋里装着智慧回来了。”这次旅行历时仅9个月，但已经是他一生中为时最长的一次远行了。旅行固然使他厌倦，却给他带来了受用不尽的创作上的财富：他看到了令人遐想无穷的大海，他接触到了明亮炽热的热带阳光，他闻到了各式各样浓郁的香气，他接触了强壮快乐、接近大自然的男男女女，总之，他领略了异域的风光和情调，开辟了任想象力纵情驰骋的广阔空间。

“城市面貌，唉，比人心变得更快！”波德莱尔仿佛从流亡中归来一样，发现了一个新的巴黎：新辟的道路，新开的旅馆，新建的剧院，新装的路灯；拉丁区的“女区”，林阴道上的“野鸡”，酒店里的醉汉，踽踽独行的老人……这一切，他竟都像第一次见到一样。巴黎变了样，到处充斥着“发财”的叫喊声，散发着新贵的铜臭味。路易—菲利普王朝越来越反动，基佐的“发财吧”这样的口号不过是为了保持大资产阶级的特权，引起了广大无产阶级、甚至中小资产阶级的强烈不满。政权的平庸和猥琐更使当年的浪漫派灰心丧气，而工人们则要求成立共和国。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新的革命又在酝酿中。

波德莱尔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回到巴黎的。这时，他和继父欧比克的关系，已经由于在选择职业问题上的分歧而迅速恶化，况且他已经成年，更加不能忍受家庭的束缚，终于带着父亲留给他的遗产，约 10 万金法郎，离开家庭，过起挥金如土的浪荡生活。1843 年 6 月，他住进了豪华的皮莫丹旅馆。他用黑红两色的墙纸裱糊房间，穿着黑外套，系着牛血色的领带，雪白的衬衫一丝不皱，一尘不染。他要用与众不同的装束和风采来表示他对资产阶级的蔑视和唾弃。岱奥多·德·邦维尔这样描绘当时的波德莱尔：“眉毛清晰，伸展如缓缓的拱形……细长，漆黑，深沉的眼睛……优雅、带着讥讽意味的鼻子……嘴巴已经由于思想的丰富而变得又弯又薄，……脸上泛起一种温暖的苍白，棕色的皮肤下显露出丰沛而纯洁的血液的粉红色调……高而宽的额头，线条清晰，浓密漆黑的美发自然地卷曲着……”这是波德莱尔最愉快最乐观的时期。他要做一个浪荡子 (le dandy)。“浪荡” (le dandysme) 一词，在他的眼中

意味着高贵，文雅，不同流俗，既有着面对痛苦而不动声色的英雄气概，又有着忍受尘世的苦难而赎罪的宗教色彩，总之，“浪荡”一词意味着“追求崇高”。他自白道：“做一个有用的人，我一直觉得是某种丑恶的东西。”有用，正是资产阶级最珍视的品质。他厌恶一切职业，决心不对那个社会有丝毫的用处。于是，他整日在城里呼朋引类，冶游滥饮。也正是在这时，波德莱尔真正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他先是结识了一批年轻的画家，进入他们的画室，“开始接触绘画的实践”。那几年，在法国文学史上又恰恰是极热闹的年份：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开始问世，贝特朗的《黑夜中的加斯帕洋》于作者死后一年出版，邦维尔以《女像柱集》一炮打响，大批以巴黎各色人等为题材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波德莱尔的朋友中又多了一位工人诗人，以谣曲著名的彼埃尔·杜邦。这时的波德莱尔已经以奇特怪异的文学趣味令人瞪目了。也是在这时，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波德莱尔在一家小剧场邂逅了一个跑龙套的混血女子，名叫让娜·杜瓦尔，并从此与她结下了不解之缘，生活和创作都深深地打上了她的印记。杜瓦尔的卑微的身世和独特的美，使波德莱尔又多了一件向资产者挑衅的武器。还不止于此，他开始吸毒，开始领教放债人的手段。然而，他并未因此而放松写诗的准备，甚至已然开始创作。他发现诗国的领土已被瓜分完毕，诸如天空、大地、海洋、家庭、异域风光等主题都有了各自的开拓者，而充斥诗坛的那些粉饰现实的无病呻吟之作只能让他感到厌恶，于是，他便暗中写些不同凡响的诗章。据阿斯里诺回忆，“这期间（1843—1844），《恶之花》中的大部分诗篇已经写出，12年后出版时，诗人无须改动什么了。他在风格上和思想上都是早熟的。”此时，他还没有发表

过一首诗，却已在诗人队伍中被视为一位“有独创性的诗人”了。1830年后一代青年诗人“似乎对他寄望很高”。他并不急于发表，而是暗中磨砺，积累着产品，打算“日后像一枚炮弹那样打出去”。

波德莱尔在两年中花去了他的财产的一半，这又一次引起了家庭的不安。欧比克夫妇不由分说，找了个公证人替他管理财产，每月只给他可怜的200法郎。这是在1844年9月21日，这是个重要的日子，对波德莱尔来说，无异于父亲去世母亲再嫁后的又一次沉重打击。用米谢尔·布托尔的话说，波德莱尔是被剥夺了成人的资格，被当成了未成年的孩子。从此，波德莱尔就在债主的追索下过日子了。他的眼中除了欧比克之外又多了一个敌人：他的公证人，典型的资产阶级秩序的代表。

作浪荡子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有钱，二是有闲。现在，波德莱尔既已失去了钱，也就不得不去干他一向最鄙薄的事情：靠耍笔杆子吃饭。他一向认为生活的最高目的是培育美，而现在却不得不多少投合公众（资产阶级）和出版商的口味，为生活而写作了。他的诗神被收买了，他绝望，愤怒，渴望着报复和成功。他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有天才的人如何还债》，幻想着能像伟大的巴尔扎克那样在债主的追逼中，突然灵机一动，安然度过难关。但是，他的那些大胆真诚的诗作屡屡遭到编辑先生们的拒绝。1845年5月，波德莱尔发表了画评《1845年沙龙》，盛赞浪漫派画家德拉克洛瓦，称他为“过去和现在最有独创性的画家”。这篇长文以新颖、感觉的敏锐和行文的果断，震动了评论界。不过，批评家本人并不满意，深为此文“缺乏个性所苦”。也许是因为《1845年沙龙》未曾取得他心目中的成功，也许是因为他的监护人使他恼怒，也许是因为他